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

秦正先（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

一九七六年·上海

说明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讲话稿《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系改编自秦正先（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的《谈谈党内资产阶级》。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自一九七六年二月开始编写，利用了北京、辽宁等地的理论讨论会和上海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材料。其初稿名为《谈谈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第二稿为《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在同年九月底定稿并排印了清样，原计划于十月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因“一举粉碎”，未成。

同期，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将《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稍作改编为八讲广播讲座，自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开始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在同年十月六日后，仍然继续广播至十月十六日的第五讲。

在“揭批查”中，一九七八年八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以“二简字”印发了上述广播讲稿全文作为黑材料，现改为简体字并将原文的“△△△”恢复原样排出，以供研究参考。

目录

[第一讲：搞社会主义革命要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播讲）](#)

[第二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变动（九月七日、九月二十五日播讲）](#)

[第三讲：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二日播讲）](#)

[第四讲：上层建筑在形成党内资产阶级过程中的作用（十月五日、十月九日播讲）](#)

[第五讲：党内资产阶级比资本家还厉害（十月十二日、十月十六日播讲）](#)

[第六讲：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规律（未及播讲）](#)

[第七讲：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方法（上、下）（未及播讲）](#)

第一讲：搞社会主义革命要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播讲）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发表了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毛主席的指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下面就谈谈我们的学习体会。我讲的题目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要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这一讲分三个问题：一、毛主席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二、毛主席的指示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三、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影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

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

毛主席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当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还存在不存在资产阶级呢？资产阶级在哪里呢？无产阶级还要不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有过一些科学预见，但限于历史条件，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不可能系统地加以解决。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看到了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国际资本的支援，还很有力量；同时，也看到了在苏维埃职员中间、在小生产者中间，事实上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严重地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列宁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为捍卫马列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宣布：苏联在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就不存在了。尽管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等，但是并没有从中引出正确的理论结论，更没有注重于教育和引导广大的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去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23页）十三年后，毛主席又严厉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狂热鼓吹的“三自一包”、“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谬论，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转引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的伟大号召，更加完整地为我党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又发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管理也是社教”等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一英明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指路明灯。

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我们只有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问题，清醒地看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战士。不然的话，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不知道革命的重点对象是谁，革命就革不到点子上，就不是一个清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是很危险的。

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毛主席的指示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

承认还是否认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问题，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一切现代修正主义者，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显露出他们的反革命原形。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我们识别和批判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现代修正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否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认共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列宁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0页）唯生产力论，就是否认阶级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质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我国正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刘少奇就跳出来胡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邓小平也和刘少奇同唱一个调子，胡说：“社会主义制度要注意调查，阶级已经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在近二十年来，虽然遭到革命人民的多次批判，但它还是一再被修正主义者拿出来宣扬。邓小平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这种货色。

资产阶级是真的消灭了吗？阶级斗争真的没有了吗？谎言掩盖不了事实。人们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不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在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而且在共产党内就存在着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不但是长期的、曲折的，而且是很激烈的。

既然资产阶级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伙人硬说没有了呢？原因就是他们自己是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挂帅人物。他们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大难临头，怎么办呢？于是就炮制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大叫大嚷：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阶级斗争没有了。以此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志。

其实，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他们自己是从不熄灭阶级斗争的，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转引自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邓小平也是这样。他口头上讲“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可是他在行动上却组织资产阶级“还乡团”，天天向无产阶级进攻，极其凶狠，恨不得把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口吞下去。可见，他们讲阶级斗争熄灭，是骗人的，只是要别人不要讲阶级斗争。如果人们相信了他们那一套，解除了思想武装，丧失了对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警惕，那末，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更加放肆地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类，他们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说阶级斗争熄灭了，并不奇怪。问题是，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往往看不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这是什么道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小资产阶级由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常常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他们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最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特

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页）他们倾向资产阶级，当然对客观存在的党内资产阶级，就往往看不清楚。因此，对于这些同志来说，要搞清楚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就要转变立场，把立足点移过来，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上面我们讲了第二个问题：毛主席的指示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

现在我们谈第三个问题：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影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

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还要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破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我们知道，阶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人们头脑里产生的，它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经济运动是比较复杂的。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是“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页）否则就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分析经济形式不容易，那末，研究由经济形式和它的运动所决定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当然要花更大的力气。在历史上，人们对于老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曾经经历了几百年的长过程。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才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本质。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也必须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只有把我们的思想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才能心明眼亮，才能真正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

我们有的同志，对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觉得不好理解，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有关。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都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归根结底表现为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之间的斗争，在阶级关系上必然表现为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和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老的资产阶级已被推翻的条件下，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在这块旧土壤上依然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又由于共产党全面地领导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这种新的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在党内产生。因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将越来越突出地在党内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成员也不是清一色的，是可以分析的，是一分为二的。在我们共产党内，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派，这是主流；也确实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走资派，这是逆流。党内走资派代表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没落的反动势力。我们党公开申明党内存在着资产阶级这一事实，这不仅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恰恰说明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党内资产阶级。只有把事物的本

来面貌如实地向人民讲清楚，动员人们把党内斗争坚持下去，才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47页）对于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也应当这样。因此，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把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就是十分重要的了。只有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自觉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树立和党内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变动

（九月七日、九月二十五日播讲）

今天，准备围绕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谈谈我们的学习体会。主要谈三个问题：

- 一、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
-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 三、党内资产阶级成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

先讲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

要搞清楚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页）列宁也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

集》第四卷，第84页）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过渡时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而这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因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01页）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国在这个社会大变动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和发展了起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等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共产主义因素。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随着共产主义因素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页）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这些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是相矛盾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如果让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自由泛滥，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可能重新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两方面的特征，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463页）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但那些丧失生产资料的老资产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而且，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既然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新的资产阶级就会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资产阶级就将作为一个阶级始终存在着。列宁说过：“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在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只要资产

阶级法权存在，资产阶级就不会断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会长期继续下去。

毛主席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红旗》杂志1968年第13期）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中普遍存在，并且贯串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这一斗争的谁胜谁负，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

过渡时期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这里包含着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而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中，阶级关系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说，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关系大变动的时期。

下面我们就来谈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善于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对于指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主席说：“**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那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那些阶级是要打倒的。**”（《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2页）毛主席在领导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把研究阶级关系及其变化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上，对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为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论述，分析、研究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才能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末，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其他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的阶级，是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贫雇农和中农为主体的农民阶级，以及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等小资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经过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地建立起来了。“**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阶级变动》、《列宁全集》第25卷，第118页）地主、资产阶级已被打倒。无产阶级由旧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转化为新社会的统治阶级和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变成了执政的党。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革命的性质

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处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强大的国家机器，并通过自己的国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同集体农民结成了巩固的联盟，并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因而在阶级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农民是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我国现在的农民，绝大多数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同工人阶级结成了新的巩固的联盟，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农民仍然有两重性，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在小私有经济仍然存在和集体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两极分化的现象还会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要争夺农民，农民中占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很坚定，一部分富裕中农则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无产阶级从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从统治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个转化是经过重大的斗争才实现的。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曾经多次纠集自己的阶级队伍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当这种进攻经过“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无产阶级粉碎以后，资产阶级又纠集自己的阶级队伍，由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章罗联盟”充当指挥，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这次进攻经过无产阶级的有力反击，也被粉碎了。从此，老资产阶级就声名狼藉，溃不成军，想要公开聚集起来同无产阶级全面较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很困难了。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在社会上还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从工人一部分、农民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是社会主义时期整个资产阶级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一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一般是通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贿受贿、侵吞国家和集体财富，来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活动的。但是，这一类新资产阶级分子是分散的，在社会上也臭不可闻，他们只能充当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别动队，当不了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指挥力量。

那末，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主力部队到哪里去了呢？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到共产党内来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共产党内了。党内资产阶级，除了一部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之类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而外，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是混入共产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如刘少奇之流。有些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毛主席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红旗》杂志，1976年第6期）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一类人就是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时期的走资派的。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资产阶级的出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变动、资产阶级队伍重新组合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党内走资派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刚才，讲的是第二个问题，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现在谈第三个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成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

自从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党内就有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充当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中国的陈独秀，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国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等，就是这一类人物。但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混入无产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并不是它的核心力量，而只是它的附庸。当时，资产阶级有它自己公开的政党，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命脉，因此，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它的司令部，它的主要政治代表，是在共产党外而不是在共产党内。混入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混入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可以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这些人在整个资产阶级中的地位只相当于由在共产党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派出的别动队，当这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路线遭到批判，他们的阶级本质已被揭露的时候，他们往往从暗藏的别动队变成公开的资产阶级走卒。陈独秀、张国焘在党内受到批判以后，公然叛党、叛变革命，当了可耻的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就是明证。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共产党成了执政的党，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党内资产阶级就不再作为党外资产阶级的附庸出现了。但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党外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有一定号召力的情况下，党外资产阶级还是能组织自己的司令部，推出自己的头面人物，同无产阶级较量的。这时，党内资产阶级还没有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而是同党外资产阶级相互勾结，充当党外资产阶级的靠山。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外资产阶级失去了生产资料，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屡遭失败，名声很臭，力量逐步削弱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党内资产阶级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党内资产阶级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新形式的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党已成为执政的党。这个党受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委托，掌握着一切国家权力。资产阶级懂得，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即通过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执政党的权力，比党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活动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党外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武装侵犯苏维埃共和国，希特勒全面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都被打败了。可是，当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以后，没有多久，就红旗落地，党变修，国变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内资产阶级即使[只]篡夺了一部分权力，干起复辟活动来，作用也比党外资产阶级大得多。刘少奇一伙一

刀就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纠集几个死党发动没有成功、也不会得逞的反革命政变，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在全国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挑起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试问，党外资产阶级有这样大的作用吗？

党内资产阶级能够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还因为它能够拼凑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推出自己的挂帅人物，纠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都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不过在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暂时得逞了，在我国，由于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刘、林、邓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都被粉碎了。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打掉一个党内外资产阶级挂帅人物，只是一个战役的胜利，新的挂帅人物还会出现。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我们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加强学习，深入批邓，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第三讲：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二日播讲）

在上一讲，我们已经讲了随着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党内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个问题。那末，党内资产阶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今天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我讲的题目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恩格斯说：“**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党内资产阶级，我们也必须按照恩格斯说的，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从社会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些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它产生的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那末，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怎样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呢？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

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第二，商品制度滋生着新资产阶级；

第三，分配差别必然引起阶级差别。

现在先谈第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首先表现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一无所有，只能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给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列宁说：“‘**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列宁这里讲的是由全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情况，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步。照列宁的说法，即使“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257页）何况我们现在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形式，此外还有部分的私有制。这就是说，在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所有制不是物，而是一种劳动的社会关系。判断一种所有制，要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采取怎样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生产活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同的结合方式，决定和区分了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分离的，这二者是以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商品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入生产过程的，这是一个劳动者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这样一种所有制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如果一个人占有大批货币，但是他既不去购买劳动力，又不去购买生产资料，不把它们投入生产过程去创造出剩余价值，那他只是一个守财奴，还不是资本家。资本家是依靠资本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一个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那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又是采取怎样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生产运动的呢？这是我们研究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关键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宣告历史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时代开始过去了，开辟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新时代。千百万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成了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还和资产阶级法权关系联结着，而不同于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这种资产阶级法权规范表现在：（一）劳动者要按照自己提供的劳动量，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以后，领取等量产品；（二）社会还要有一个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来组织社会劳动。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这种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就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在这个国家领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这样，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上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就具有两重性：既

有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所有制关系，就不能不兼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所有制关系的特点或特征。

既然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有一个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来组织社会劳动，那就必然还要由国家或者劳动群众选派一部分代表来行使领导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职能。这样，社会就会有一部分人主要从事脑力劳动，而另一部分人则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这种社会分工的存在，是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在原始社会末期，原始公社为了维护一定的共同利益，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由个别成员来行使管理的职能，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些个别成员就由原来的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最终成为奴隶主阶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分析过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下，担任领导和管理社会生产的代表，他们的权力是劳动人民给的。他们处在一个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中，在壮大所有制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总目标下，组织人们遵守法权规范为社会劳动。问题就发生在这里，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尽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避免，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职能。这种职能很容易导致“一长制”，实行“管、卡、压”，使担负领导和管理社会生产的代表从社会的公仆逐步地变为社会的主人，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而逐步地成为雇佣劳动者。恩格斯指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通过这种“一长制”的道路，逐步演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这种“一长制”，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以前已经逐步得到了发展，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则更进一步泛滥成灾，并且在法律上固定了下来。苏修的《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企业实行“一长制”，厂长、经理掌握“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苏修农业部建筑托拉斯经理有一句自白，他说：“托拉斯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广大工农劳动人民则已彻底地同生产资料相分离，重新沦为工资雇佣奴隶。据苏修报刊透露，在一九七〇年，仅工业部门就解雇了六百六十三万职工。一九七四年，苏联塔斯社供认，苏联有两千五百万人是“经济困难家庭”的成员，占苏联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经济困难的家庭的劳动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挣扎在饥饿线上。这就是苏联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复辟的严重后果。

毛主席极其重视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为了限制所有制关系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示和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关于领导权问题的讲话等一系列指示中，一再教导我们，**“管理也是社教。”**管理人员要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否则，**“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并且明确提出了工厂企业的领导权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的问题。毛主席这一系列指示，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在斗争中不断完善和巩固，防止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复辟，逐步铲除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指明了道路。同时，这也是对“一长制”的深刻批判。坚持还是

反对这条道路，是在所有制关系方面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几乎没有例外，党内资产阶级总是反对这条道路，拥护“一长制”的，刘少奇、林彪如此，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胡说什么工人阶级是“破椅子”、“不可靠”，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说穿了，就是否定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所有制关系的主人，就是要扩大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亲自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就是鼓吹“一长制”的黑标本。

“一长制”既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又压制工人群众，把工人当作单纯的劳动力，完全按照资产阶级法权规范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是一个加速培植党内资产阶级、培植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的过程。无产阶级只有坚持走毛主席指明的道路，才能逐步解决所有制关系方面的问题，彻底战胜党内资产阶级。

上面讲的是第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商品制度滋生着新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分两点来讲，第一点讲一下，党内资产阶级是从商品制度这块土壤中产生出来的；第二点讲一下，党内资产阶级从商品制度中产生出来，又利用商品制度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先讲第一点：党内资产阶级是从商品制度这块土壤中产生出来的。

毛主席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指出：“**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1957年版第11—12页）那末，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呢？它同产生新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又有什么联系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完全是由价值规律在那里调节的，是由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任何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开辟了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开始发生调节作用。从此，人们可以努力做到按照整个社会的需要，制订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的计划了。

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商品制度。这就是说，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在计划规律的调节下，还同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作用联结着。当然，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范围，已经和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了，而且已有可能被人们逐步认识，自觉运用。但是，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劳动产品只要一旦当作商品来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各个商品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总是各不相同的，它们的个别劳动时间的耗费也是不相同的。但是他们的产品要当作价值来实现的时候，就只能按照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这种用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不同的商品生产单位，体现的就是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方面，严重地存在着。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方面是由人们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另一方面，“**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商品世界神秘的纱布，就会遮住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模糊起来了。这样，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就还会转化为物和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还会转化为物的能力。因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们大量看到的是价值的转化形态，例如：产值、利润、税金、成本、价值、工资、利息，等等。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能够综合地体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能够综合地反映一个工厂或一个商店的生产经营发展情况的，也还是那些货币体现的价值，如产值、成本、利润，等等。这一系列广泛存在着的价值关系，归根到底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在商品的交换价值面前，各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否定着每个企业生产各种商品的个别劳动量。同时，用货币表现出来的各种商品的价格，同商品的价值不可避免地要有背离，有些商品的价格高于它的价值，有些商品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这样，在实现商品的价值时，以货币表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即总产值，就掩盖了各个企业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量的实际耗费情况。在生产商品时投入的个别劳动量多的，未必会实现较多的总产值。相反，在生产商品时投入的个别劳动量少的，也未必会实现较少的总产值。因此，在商品的总产值面前，如同在货币面前一样，是没有臭味的。在花费个别劳动量大体相同的状况下，生产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完成的总产值指标，比生产那些价格低于价值的商品，要容易得多。这样，它就会驱使社会主义经济部门和企业的一部分领导人想方设法以较少的个别劳动耗费去获得较高的总产值，这就是产值挂帅、利润挂帅。这时，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必将竭力摆脱计划规律的调节，而听任价值规律去调节了。这种领导人实际上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来，不但破坏着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而且实际上在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分割为部门的、集团的所有制。发展下去，还会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党内资产阶级就这样产生出来了。上面讲的是第一点：党内资产阶级是从商品制度这块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下次再谈这个问题的第二点：党内资产阶级从商品制度中产生出来，又利用商品制度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这一讲的第三个问题：分配差别必然引起阶级差别。

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一讲的第二个问题：商品制度滋生着新资产阶级。这一问题分两点，已经讲了其中的第一点，就是党内资产阶级是从商品制度这块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今天接着讲第二点：党内资产阶级从商品制度中产生出来，又利用商品制度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处在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的一些部门、一些企业这样的经济地位。他们把生产经营活动引上了由价值规律调节的道路，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严重的。由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就必然会出现一部分商品严重短缺、一部分商品大量积压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供求规律也就必然发生作用。积压的商品，往往不得不削价处理，不能实现其原来的价值；短缺的商品则难免价格上涨，给投机倒把分子以可乘之机。在实行计划价格的条件下，短缺商品的上漲，虽然一般不立即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上，但它必然地会表现在自由市场上。人们要得到那些短缺商品，就不得不按照高于计划价格的价格才能买到。这样，高于计划价格的那一部分货币，就落进了私人

的腰包。社会上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经过这样的途径，由党内资产阶级培植出来的。

商品制度滋生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又利用商品制度培植社会上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全过程在今天的苏联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

在商品制度下，苏联早就出现了党内资产阶级。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这个阶级在苏联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公然宣布：“价值规律是公有生产的主要的和绝对的调节者”，还说：“价值范畴是管理国民经济的唯一经济杠杆”，什么“利润是评价企业的唯一标准”等等。苏联的企业为了追逐利润，捞取奖金，就只愿意生产利润高的产品，不愿意生产利润低的产品，严重破坏了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客观的比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泛滥成灾，是必然的。通过开后门等种种手法将稀有商品弄到手，然后以两倍或三倍、四倍的高价卖出去，这在苏修那里已经成了极其普遍的现象。结果是，官方市场货架空空，黑市上应有尽有。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敲骨吸髓，拿到微薄的工资以后还要被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抽筋剥皮。今日的苏联，已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制度。在这种商品制度下，一方面，既大量产生出党内资产阶级，又通过党内资产阶级大量培植出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使广大劳动人民越来越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压迫，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苏联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一切以卢布为轴心。“卢布就是火车头”，已成了苏修的座右铭。在这种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人和人的相互关系。既然一切以卢布为轴心。人和人的关系也就必然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那里还有一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子呢？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苏联资产阶级，完全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是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死敌。

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和苏联复辟的历史教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转引自197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商品制度是一种包括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历史上，老的资产阶级就是从商品制度产生出来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制度还会滋生出党内资产阶级。商品制度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这是老资产阶级得以继续存在，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得以不断产生的最重要的土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商品制度，就是限制商品制度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刘少奇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邓小平鼓吹在利润上“挂点帅没关系”，目的都是妄图扩大商品制度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妄图扩大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国广大群众和干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制度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对限制商品制度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日益提高。前一时期，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刊登了上海工业玻璃五厂的先进事迹，他们为了满足市场、满足广大工农兵顾客的需要，在每班劳动力要增加五倍、产值要减少近二千元的情况下，主动承

担并出色地完成了茶盘的生产任务，而且通过发动群众，深挖潜力，大搞工艺革新，产值计划也完成了。既满足了社会需要，又完成了产值计划，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很好地解决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这件事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商品生产是价值的生产，人们在交换价值面前往往要被物所支配，要被价值形式所支配。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建立了人支配物的前提，人们在交换价值面前，不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完全无能为力了，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限制商品制度所带来的危害的。这种自觉限制商品制度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将是不断缩小以至逐步铲除产生党内资产阶级、新资产阶级分子土壤的过程，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因素不断成长、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

上面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商品制度滋生着新资产阶级。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分配差别必然引起阶级差别。

分配上的差别是阶级差别的重要标志。原始公社就是随着分配上出现差别而解体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经分析过原始公社解体的过程，他说：“**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7页）分配关系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但是分配关系又反作用于所有制，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同分配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密切关联的。

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同其他社会一样，决定于所有制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遵循的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是一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它的前提是承认劳动者的劳动，是自己的劳动。“**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1页）这就是“**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劳动者按照自己提供的劳动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以后，领回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但是，各个劳动者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有的劳动者能力强些，有的劳动者能力弱些；有的赡养人口多些，有的赡养人口少些。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都是按同等劳动领回相同的工资。这样，社会就会出现富裕程度不同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就还占着统治地位。特别是，按劳分配原则在它的实践中，又进一步承认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样，分配上的差别又得到了扩大。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大官们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要加以保护。这就说明，这些大官们，已经成了修正主义的大官，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必然要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扩大分配上的差别，维护自己的特权。这种人们在分配上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党内资产阶级

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从处在大官们的利益这种经济地位上转化过来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有的如果不警惕，也会变。党员的一部分之所以会变，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同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引诱是分不开的。

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他们的工资收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从工人农民为社会提供的积累中获得的。他们都是工人农民养活的，但却不为工人农民谋利益。他们占有这一部分工人农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实际上就是对工人农民的剥削。只不过，他们通过按劳分配，取得工资形式的合法收入，形成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党内资产阶级的剥削活动，决不会到此为止。党内资产阶级，在他们当权的条件下，都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参与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通过这种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他们不但利用特权，采取“合法”和种种非法的手段，掠夺工人农民为社会劳动而创造的收入，而且掠夺一部分工人农民为自己劳动而创造的收入，现在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况。

在苏联，工人农民的劳动收入表现为工资和奖金。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工农的这一部分劳动收入，也要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在工业中推行的所谓“谢基诺试验”，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试验”要求企业通过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办法裁减人员，解雇工人；人员减少以后，所谓“节余”的工资基金就全部或大部分留归企业支配，作为奖励基金。但是，这种奖励基金，在职工人得到的少得可怜，其中绝大部分都落进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腰包，据苏联七百零四个企业的调查材料，一九六八年，工人得到的奖励基金只占百分之十八点一，其余百分之八十一一点九都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攫取去了。至于苏联工人农民原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税金、企业利润等形式为社会创造的纯收入，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篡夺全国政权以后，这些税金，企业利润统统归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用来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这些税金，企业利润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据苏修公布的材料计算，苏联工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高达百分之二百，比沙皇时代的剩余价值率高出一倍。在全部国民收入中，近年来大约有百分之五十二到百分之五十五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所侵吞和瓜分。

由此可见，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吸血鬼。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党内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象在苏联那样明目张胆、为所欲为地全部攫取工人农民为社会创造的纯收入。但是，在党内资产阶级控制的地方、部门和企业，他们还是能够将工人农民为社会创造的纯收入的一部分，变成非法的收入，大量地转到自己的腰包中去。而且由于党内资产阶级具有培植社会上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功能，他们通过市场关系事实上把国家或者集体的一部分纯收入，转入到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从单个的人来考察，在这一过程中走资派可能没有取走非法的收入，但从整个资产阶级来考察，在这一过程中却把一部分国家和集体的纯收入取走了。因而，不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在那里发挥复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来分析，仅仅停留在分析单个的人获

得了多少使用价值和享受，来判断他是不是走资派，是不是党内资产阶级，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满足于停留在这种对事物的表面的分析，甚至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这是讲的第三个问题：分配差别必然引起阶级差别。

以上我们从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谈了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问题。总括起来说，就是在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但是它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里既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又有着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的集中表现，就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和分配这三个方面，和在社会经济运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中，经过资产阶级法权的培育，而不断产生出来的。我们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就要不断限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从而把党内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的末代子孙彻底加以埋葬！

第四讲：上层建筑在形成党内资产阶级过程中的作用

（十月五日、十月九日播讲）

同志们，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我们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上一讲，我们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的经济基础。那末，上层建筑在形成党内资产阶级过程中，又有哪些作用呢？这一次，我们准备谈谈在这个问题上的学习体会。现在分四个方面来讲：

先讲第一个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上层建筑范畴，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就是国家，因此，我们把国家问题搞清楚，对于搞清楚政治上层建筑在形成党内资产阶级过程中的作用，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从来就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暴力组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它保卫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本主义经济

基础的集中表现。因此，无产阶级要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要拿起武器，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那末，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转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这就是说，它已不同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了。它不是少数剥削者镇压多数劳动者的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多数劳动者镇压少数剥削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历史的巨大飞跃。但是，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仍然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说，这个国家还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要保障那些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制度。这种国家职能，跟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是没有多少差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两重性，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两重性的集中表现。一方面，由于所有制发生了变更，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另一方面，由于还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国家又跟旧社会差不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矛盾，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在国家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激烈地、长期地展开。这一斗争，深刻地说明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讲的第一点体会。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官僚主义是滋生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转引自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以后，始终存在着一个巩固国家政权的问题。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同样，一切反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国家政权问题。因为，反革命势力在失去他们的政权以后，总是梦想夺回他们的政权。只有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才能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就必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要巩固政权和资产阶级要夺取政权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要重新篡夺政权，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明火执仗地发动反革命武装进攻。另一种则是钻到无产阶级政权内部进行侵蚀瓦解，和平演变，等待时机，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不改变政权名称、旗号下变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为资产阶级性质。

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两种方式，往往是交替使用的，但是比较起来，前一种方式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因而不容易得逞；后一种方式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因而是最危险的。这种危险性，不但在于资产阶级这种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方法十分荫蔽，不易为人们所察觉，而且在于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政权，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以外，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恶习。例如，资产阶级官场中的那种做官当老爷，等级森严，

官僚习气，因循守旧，敷衍了事，等等。这种在无产阶级国家机构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政权的职能和恶习，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导下能够逐步加以限制和克服，但是需要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才能解决。如果听任它发展，或者加以扩大、强化，那就会不知不觉地使无产阶级政权改变颜色。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这个问题，提醒俄国无产阶级保持警惕。他说：“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把他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进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6页）一九二二年末，列宁指出：“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的新型国家，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个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是为了改善机构。”

（《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619页）过了几天，列宁又指出：苏维埃国家机构“是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629页）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这种资产阶级政权的恶习，就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恶习。由于无产阶级政权同时又是统一领导和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政权，因而这个政权的官僚主义恶习往往又是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如果说，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那末，无产阶级政权机构的官僚主义恶习就是在这个土壤上培育党内资产阶级的气候。

“全部工作都应该是为了改善机构”，列宁当时的这个指示，并没有在苏联引起高度重视，当然也就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在列宁逝世以后，苏维埃政权机构中官僚主义的恶习也没有逐步得到铲除。而且，当时人们又没有认真接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教导，反而强化了苏维埃政权保障资产阶级法权的职能。这样，在苏维埃政权中，官僚主义恶习事实上得到了发展，使苏维埃政权越来越成为党内资产阶级麀集、活动的场所。有了这个条件，再加上经济基础方面大量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类一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就很容易了。

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十分重视改革上层建筑、改革国家机关的问题。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第12页）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而且要解决上层建筑问题。我国人民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远远没有根除，而且在一部分国家机构中还相当严重，以至有些人的官僚主义作风不但没有克

服，而且得到了发展，甚至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既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上，又是在官僚主义的气候下滋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又粉碎了邓小平一手挑起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当前正在全国胜利开展的深入批邓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党内资产阶级，荡涤了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污泥浊水，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对国家机关的一个重大的改革。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转引自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走五·七道路，实行三同，与工农群众划等号，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总之，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5页）这对于战胜党内资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装。

随着所有制的变更和国家政权性质的变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一切腐朽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开始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但是，旧的经济基础变更了，反映这个基础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孔孟之道原来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但是，它也可以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所接受，用来作为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同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反动思想体系也可以成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

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07页）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在旧社会这具“死尸”腐烂发臭的过程中，象毒菌那样生长起来的，因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这个阶级身上表现得特别集中，特别顽固。我们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一类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全盘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全盘继承了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形成不了一个阶级，这是对的。但是，当一种意识形态，例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过全面细致的加工，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传统观念，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它能征服其它阶级的某些分子到本阶级方面来，这也是屡见不鲜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党内资产阶级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意识形态阵地是决不放松的。他们正是通过意识形态阵地，散布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鼓吹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潮，提出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就做了大量的反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苏联社会就在这伙叛徒们刮起的反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妖风毒雾中，从社会主义道路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一伙苏修的走卒，也妄图按照苏修的路子，把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我国教育、文艺、卫生等上层建筑领域，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占领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止息，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在邓小平重新工作的一年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在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教育、科技等战线上这股风刮得那么凶，那么猛？为什么他们要声嘶力竭地诬蔑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大好形势，攻击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不但证明资产阶级的势力在这些领域是不小的，而且还证明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十分重视抓意识形态，同无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把它作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桥头堡。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就是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黑标本。

列宁教导我们：“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9页）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透过意识形态方面刮起的歪风，跟踪追击，寻找风源，党内资产阶级的面目就会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党内资产阶级，堵死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的道路，必须长期坚持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中占领和改造整个上层建筑。

现在，讲第四个问题：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党内资产阶级最本质的政治特征。

列宁指出：“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列宁选集》第1卷第660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领导责任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各政党之间的斗争仍然存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由党外逐步转移到党内。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它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样，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还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成为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分水岭。

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荫藏在共产党内的一个修正主义的政治派别。他们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是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反过修正主义路线又在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方面，产生很大的危害。党内资产阶级原来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不直接雇工剥削，他们要达到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剥削劳动人民的目的，他们更多地是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只要沿着修正主义路线走下去，必然到达资本主义的彼岸，即使继续打着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旗号，但事实上已经滚进资本主义泥潭。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也是通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部分地区和单位资本主义势力泛滥的。因此，识别修正主义路线，“顺藤摸瓜”，就成为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十分重要的途径了。

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我们要在斗争中不断地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讲：党内资产阶级比资本家还厉害

（十月十二日、十月十六日播讲）

同志们：上一次，我们讲了，“上层建筑在形成党内资产阶级过程中的作用”。今天讲，“党内资产阶级比资本家还厉害”，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这一讲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能量很大；

第二个问题：党内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特别凶狠；

第三个问题：党内资产阶级吸工人血比资本家更贪婪。

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能量很大。

党内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能量很大，这是同党内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分不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必须由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负责领导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这种国家政权同国民经济紧密结合的特点，决定了党内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跟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是不同的。在对国家政权的关系上，资本家有当权和不当权之分，而走资派都具有国家任命担任某种职务的

身份；资本家的一小部分，即使担任国家机构的各种职务，但是在资本家个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他不可能担负起全面领导和组织社会生活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其影响所及，就不只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会很快地波及整个社会的生活，给整个社会生活造成很大的危害，这就是走资派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地方。

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复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苏联党内的走资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在“经济改革”的幌子下，向全国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章程”，强制推行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使所有制方面已经取消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得到恢复，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把“按劳分配”变成一个外壳，使广大工农群众变成工资雇佣奴隶。苏联的党内资产阶级完成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是很快的，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我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统帅下，党内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一个个被粉碎了。但是，党内资产阶级在被揭露出来以前，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小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他重新工作不到一年中，就利用他所窃取的权力，在各条战线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一时乌云翻天，黑浪滚滚。特别是在这股黑风刮得凶猛的地方，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是党外资产阶级想做而难以做到的。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党内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特别凶狠。

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但是，在党内资产阶级掌握权力的地方，就会把它变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会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就曾经运用他们窃取到的权力，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广大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关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号召，纷纷起来造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的时候，刘少奇就立即伙同邓小平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疯狂围剿革命派，把革命群众打成所谓“反党分子”、“黑帮分子”，对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妄图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熊熊革命烈火。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加速复辟资本主义，竟然组织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小“舰队”，大搞特务训练和特务活动，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对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下毒手。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疯狂组织“还乡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打成所谓“勇敢分子”、“反潮流分子”、“三反分子”，并且一手挑起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实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暴露得更加彻底。毛主席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转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假社会主义，真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是今天苏联社会的现实。在今天的苏联，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政治、经济、军事、科研和文化教育，到处都有特务机构，到处都设立了所谓“监督哨”，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特务监视。苏修叛徒集团在“加强法制和秩序”的名义下，还炮制了一系列反动的“法令”、“条例”，为他们的法西斯罪恶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这些所谓“法令”和“条例”，可以随意把人民的反抗行动污蔑为“聚众骚乱”，加上“国事罪”的罪名，判处流放、罚苦役、重刑甚至死刑，苏修叛徒集团不仅设立了大量的监狱和“劳改营”，还专门开设了许多所谓“精神病院”。许多苏联人仅仅由于对苏修法西斯统治表示不满，就被苏修叛徒集团宣布为“疯子”、“精神失常的人”，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和摧残。这些所谓“精神病院”，由苏修特务机构“克格勃”直接控制，“病院”里的所谓“医生”对“病人”不但可以任意拷打，还可以强制注射毒药，经过这样的折磨，许多所谓病人真的变成了精神病，有的甚至被活活折磨而死。无数血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实行的法西斯专政，同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完全是一样货色！

凡是党内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或者在局部范围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就一定要实行法西斯专政，更加凶狠地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这是一个规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规律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在走向灭亡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被打倒，离坟墓更近了。党内资产阶级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整个资产阶级走向灭亡过程中的一翼，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党内资产阶级所处的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它必然是代表整个资产阶级进行垂死前的挣扎，阻挡历史的车轮前进，因而特别反动，特别疯狂。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写照。在资产阶级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他们还撑起所谓“民主”的旗子，当作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块遮羞布。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统治，资本主义内部一切矛盾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斗争中阶级觉悟日益提高，他们也就利用了资产阶级高喊的所谓“民主”去造资产阶级的反。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把这块“民主”遮羞布剪得越来越小，甚至干脆不要了。毛主席指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92页）今天的苏联不正是这样吗？在苏修法西斯专政下，连一片资产阶级“民主”布也没有了，这正好暴露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伙法西斯暴徒色厉内荏的反动虚弱的本质。

党内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权力能够达到的地方，必然要搞法西斯专政，这是因为，一方面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处在灭亡前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受过社会主义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对党内资产阶级反抗的加强。党内资产阶级，是社

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尽管是荫蔽的，但是他们既要搞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荫蔽得十分彻底。革命人民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受过社会主义革命的锻炼，总是会识破他们的阴谋的，总是要起来反抗的。经过列宁、斯大林教育的苏联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对苏修叛徒集团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经过毛泽东思想的哺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更是不能容忍党内资产阶级干资本主义的勾当。过去，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窃踞很大一部分权力，搞修正主义的时候，革命群众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很快就看穿了他们的阴谋，纷纷起来抵制。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处境，也迫使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就必然要用反革命暴力对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镇压。但是这样一来，只会更加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更猛烈的反抗，最后被人民群众彻底打倒！

最后，我们讲第三个问题：党内资产阶级吸工人血比资本家更贪婪。

吸血鬼，这是工人群众对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的绝妙写照。毛主席在分析党内走资派时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转引自197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党内资产阶级和老资产阶级吸工人血的共同的阶级本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靠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养肥自己的。党内资产阶级并没有私人雇工开厂经商，不同于一般资本家，那末，他们是怎样吸工人血的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这一讲中，已经提到了。我们曾经讲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工资收入，只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了解一下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所谓劳动是怎样看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开厂，管理企业，也要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这似乎也是一种劳动。但是应该怎样来看待资本家的这种所谓劳动呢？马克思指出：“**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别人劳动的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35页）资本家管理生产的过程，就是剥削工人、吸工人血的过程。这是履行资本的剥削职能，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因此，他们取得的所谓工资，就是彻头彻尾的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

党内资产阶级的全部工作，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为此花去的精力的确也不小，但是他们越是在这方面绞尽脑汁，对党对人民的危害也就越大。他们的这种所谓“劳动”和资本家的那种所谓“劳动”有共同之处，也就是说，党内资产阶级的工资收入，也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是吸工人农民的血。

党内资产阶级吸工农的血，当然决不限于每月所领取的工资份额。老资本家的贪欲，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只要工人身上还有一滴血，一块肉，一根筋，吸血鬼就决不罢休。党内资产阶级有着同老资本家一样的吸血本性，但是，党内资产阶级比起老资本家来，显得更为贪婪。他们的格言是：“只要我能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党内资产阶级特别贪婪的本性，具体表现在哪里呢？他们千方百计扩大工资等级差别，从高额工资中扩大他们的剥削份额：他们还利用他们对社会纯收入的支配权，通过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巧立名目，化公为私，大量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不是象老资产阶级那样，为了夺回自己已经丧失了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有过的生产资料，恨不得把全国人民的财富一口吞下去。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都具有这种贪婪性，他们都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地吸工人、农民的血。他们对资产阶级法权特别不满。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却恶狠狠地责问：“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吗？”并大肆叫嚷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保护这些修正主义大官们的特殊利益。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内资产阶级只是部分地窃取了国家权力，他们吸工人和农民的血，必然要受到革命人民的严厉批判。但是，在苏联就不同了。那里已经全面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国家政权，垄断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垄断了消费品的分配大权。在“按劳分配”的幌子下，他们大搞高工资和高奖金，以及五花八门的个人津贴，用种种合法的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有苏联工人农民创造的巨额剩余价值。据报道，苏修党政机关，部长级当权派每月工资从七、八百卢布到二千卢布。军事系统的月工资，军长一千卢布，集团军司令一千四百卢布，方面军司令一千八百卢布。他们除了工资以外，还领取大量名目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在工厂企业，经理、厂长、总工程师的基本工资三百到五百卢布，但是加上兼职工资、附加工资和奖金，也可达一千多卢布。在科技文教界，具有科学院院士头衔的研究所所长的基本月工资在一千到一千五百卢布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津贴，如学位津贴、兼职津贴，以及演出费、稿费、版税等等。这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占有比一般工人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吮吸人民的血汗，挥金如土，过着糜烂的生活。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穷奢极欲的私人生活，还不能完全反映苏联劳动人民受剥削的深度，因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世界，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他们所用的巨额军费，也是吸工人、农民的血。根据计算，美国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九六二年为百分之十五点九，一九七三年为百分之十点九；而苏联一九六二年为百分之十四，一九七三年则上升为百分之十八点三。一九七三年苏联国民收入只及美国的百分之六十六，而军费开支金额比美国还要高。苏修把这样大量的社会财富投入扩军备战，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在希特勒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夕，德国的军费开支也只占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庞大军费开支，给苏联劳动人民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一九六〇年，苏联居民每人平均负担的军费为八十九卢布，一九七〇年为二百零五卢布，一九七四年则增加到二百七十三卢布。

列宁在分析资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指出：“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48页）这个分析，完全适用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但是，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已经和正在激起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反抗。工农群众旷工和怠工日益发展。据苏修报刊透露，一九七二年，由于工人旷工和怠工，仅仅工业部门就损失了五千九百万个工作日。这个数字比美、英两国同年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的总数还多（美国损失二千六百万个工作日，英国损失二千三百九十万个工作日，共计损失四千九百九十万个工作日）。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们对社会生产所起的阻碍破坏作用，充分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是垄断的、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一群吸血鬼是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死敌，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要革命的，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灭亡的日子是不会很长的了。

第六讲：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规律

（未及播讲）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专题讲话已经讲了五讲，今天讲第六讲：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规律。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走资派还在走”。这是对在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资产阶级活动的基本规律的深刻概括。在“走资派还在走”这一基本规律下，我们在学习和批判中，归纳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五个方面的具体的活动规律。也就是说，走资派在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时，总是：（一）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烟幕；（二）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手法；（三）玩弄“清君侧”的策略；（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五）从搞阶级投降搞民族投降。

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五个方面分析党内资产阶级活动的具体规律。先讲第一个问题：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烟幕。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出现的党内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这是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反党活动所散布的两个大烟幕弹。苏联党内资产阶级是这样，中国党内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当年，托洛茨基为了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就一再鼓吹生产资料国有化或集体化以后，“再也不存在有产阶级了”；还说“马克思主义来自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纲领应该“首先来自生产规律”。苏联另一个很大的走资派沃兹涅先斯基在三十年代初期就鼓吹苏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什么“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过渡时期英勇奋斗的内容”，等等。赫

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在这两颗烟幕弹的掩护下，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也捡起这两颗烟幕弹，猖狂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我国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刘少奇就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并且伙同陈伯达从沃兹涅先斯基那里捡来黑货，鼓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则散布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已“一网打尽”，“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等谬论。邓小平一旦重新工作，就叫嚷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并且提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党内走资派，尽管他们的提法，他们用的语言，从表面上看是不同的。但是，贯串其中的黑线，都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党内资产阶级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基本点，都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以唯生产力论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邓小平鼓吹的所谓“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谬论，就是唯生产力论的新标本。他妄图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下，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揭穿了邓小平的阴谋，尖锐地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猖狂叫嚣“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这就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狰狞面目，我们在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走资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新变种，进一步掌握了党内资产阶级的这个活动规律。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手法。

党内资产阶级，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出现的。明火执仗，公开打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也有，但他们一露头，无产阶级就会把他们立即打下去。党内资产阶级却是一伙老奸巨滑的人物。他们既害怕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但又要复辟资本主义，怎么办呢？林彪说：“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这就一语泄露了党内资产阶级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手法的天机。

从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其实都是一面派。党内资产阶级也是这样。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是一种假象，他们打着红旗这一面不过是一种掩护；而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才是本质，他们反对红旗的一面才是目的。用党员的外衣来掩盖资产阶级的真面目，用“红旗”掩盖复辟活动，这是党内资产阶级自以为得计的。但是，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狐狸尾巴或多或少，或迟或早总是要露出来的。邓小平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一个典型。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指示，但是这三项指示并不是平列的，是以阶级斗争这个纲统帅的。邓小平把三项指示统统提到“纲”的地位，实际上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折中主义的手法，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迅速被毛主席发现了。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转引自1976年2月24

日《人民日报》)许多路线觉悟高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基层干部也及时识破了邓小平的诡计。党内资产阶级野心很大，力不从心，因为他们一无真理，二无群众，只好靠搞阴谋诡计、耍两面派手法过日子。今后，他们的代表人物搞复辟资本主义活动，必将继续采用这种两面派手法。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

现在，我们讲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玩弄“清君侧”的策略。

党内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必然要搞分裂主义，分裂无产阶级政党，分裂革命队伍。他们就是列宁所说的：“**总是最恶毒的分裂分子**”。（《工人的统一和选举》，《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78页）他们用的手法往往是玩弄“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

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采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洞烛其奸，尖锐地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转引自1976年第六期《红旗》杂志）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类的野心家，也继承了 this 衣钵。所谓“清君侧”，就是通过阴谋诡计来分裂党，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有一句反革命口号，叫做“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这些政治谣言的根子在哪里呢？根子就在于“邓记谣言公司”。党内资产阶级采取这种卑劣手法，充分证明他们政治上已经彻底堕落，再也没有任何真理了。列宁在批判机会主义者的时候说过：“**他们没有能力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争辩，只好施诡计，搞阴谋，耍无赖。**”（《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9页）这也是对党内资产阶级采取“清君侧”这种反革命策略的写照。

党内资产阶级一面清君侧，一面必然结朋党，搞宗派。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刘少奇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组织反革命的“大小舰队”，邓小平拼凑“还乡团”，都是结朋党、搞宗派。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任何阶级都是如此，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进行宗派活动，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以形成一支复辟的基本队伍，夺取党和国家的各级权力。

党内资产阶级通过清君侧、结朋党这样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去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权力，这是需要百倍提高警惕的。因此，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农群众手里，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是十分重要的。只要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们就要坚决和他斗。不仅斗，还要进一步挖掉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下面，我们讲第四方面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必然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一九五八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毛主席就及时提出了要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问题。当时，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

出现了一大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象一轮红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可是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彭德怀跳了出来，把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群众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刘少奇、邓小平在合作化时就反对，就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又抛出“三自一包”的黑货，妄图在所有制方面复辟已经取消了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经过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他维护、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罪恶阴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大批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象雨后春笋那样茁壮成长。这时，林彪一伙又跳了出来，攻击干部进“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缩小分配上的差距是“变相剥削”……等等，妄图阻挡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前进。邓小平原来就是刘少奇的同伙，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急先锋。他在重新工作以后，更是杀气腾腾，抛出了一系列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在教育、科技、卫生和经济战线干下了一系列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勾当。他恶事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甚至摆出一副恶霸的架势，连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也不准提，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末代王朝，继承了资产阶级在过去几百年中积累起来的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反革命经验，是很狡猾的。他们既善于进行非法的斗争，更善于进行合法的斗争。他们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进行合法斗争的突出表现。他们知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还有它的一定的合法地位，无产阶级对它只能限制，不能很快取消。于是党内资产阶级就在这件合法外衣的掩护下，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借社会主义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党内资产阶级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既可以保护老资产阶级，又可以培植新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他们鼓吹“技术第一”、“专家治厂”、“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等等，反对工人、贫下中农在文化科学上翻身，妄图维护或者重新恢复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维护这些人剥削、压迫工农群众的权力。他们鼓吹“三自一包”、“利润挂帅”，是要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使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化变质，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创造条件。他们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是为了腐蚀工农群众，使工人一部分，党员一部分腐化变质。他们反对国家机关的改革，反对老、中、青三结合，反对干部下放劳动，同工农群众实行三同，竭力扩大等级差别，是为了助长干部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使一些人变成吸工农群众血的资产阶级官老爷。

他们反对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不许批判“知识私有”、“智育第一”，鼓吹“读书做官”，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在青年中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样，以党内资产阶级为核心，通过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可以把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力量联结起来，上下呼应，形成一支对抗社会主义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复辟势力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势力。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掌握党内资产阶级强化和扩大资产阶

级法权的活动规律，研究他们进行合法斗争的反革命策略，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进行到底，就是很重要的任务。

现在讲第五方面的问题：从阶级投降民族投降。

党内资产阶级中，除了一部分原来就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和阶级异己分子以外，大多数原来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在革命转变过程中，向资产阶级投降，从革命队伍中分化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这种阶级投降分子，特别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成为民族投降分子。所以从阶级投降民族投降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又一活动规律。

毛主席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66页）。

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娘胎里就得了软弱性的毛病，这种毛病决定了他们要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投降外国帝国主义，把中国拉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党内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末代子孙，也摆脱不了这种软弱性，必然要投靠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都是投降卖国的专家。刘少奇要当“红色买办”，林彪乞求苏修的“核保护伞”，都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继承他们的衣钵，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重新工作不久，就抛出一个洋奴买办、投降卖国的“大政策”，炮制了一个《条例》。这个“大政策”和《条例》的内容，就是鼓吹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就要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这就是说，让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中国出人力，听任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掠夺我国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和投资场所。这同我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洋务派张之洞、李鸿章之流完全是一丘之貉！

党内资产阶级的民族投降活动，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总是互相呼应，并且总是得到后者的支持的。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并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92页）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特别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做梦也在想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党内资产阶级在苏修眼中，是一支所谓“健康的力量”，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苏修一直把反华的希望寄托在这支复辟力量上面。当我国党内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苏修就拍手称快；当我国党内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的坚决反击时，苏修就兔死狐悲。从苏修叛徒集团同我国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同心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走资派在国内是走到资

本主义那里去；在国际上就是走到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去。走资派既是阶级投降派，又是民族投降派。这是一个规律。他们是决不会违背这个规律的。

上面，我们从党内资产阶级通过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通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手法、玩弄“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到投降卖国的途径，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活动的具体规律。他们的这些活动规律是建筑在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样一个反动逻辑上的。对于党内资产阶级的捣乱，革命人民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密切注视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不断地掌握“走资派还在走”的活动规律，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到底。

第七讲：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方法（上、下）

（未及播讲）

（上）

上一次，我们讲了第六讲《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规律》，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七讲：《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方法》。这一讲分四个问题：

- 一、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群众。
- 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 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 四、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这一部分内容比较多，分两次讲。今天讲第一、第二个问题。

下面，就讲第一个问题：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群众。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虽然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但他们是是可以战胜的。战胜党内资产阶级，决定性的一条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路线，去战胜修正主义路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转引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路线，就能形成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反修防修大军，筑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掌握路线，最根本的是要掌握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在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

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10期）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它是无产阶级识别和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毛主席在领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一再教导我们：“**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3页）广大群众掌握了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又多次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转引自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毛主席又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转引自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在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中又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转引自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反复强调要使全国人民都掌握马克思主义路线，这里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是全国人民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伟大实践。实践证明，广大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党的基本路线，就有了辨别是非的标准，能够及时识破党内资产阶级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转引自1967年6月29日《人民日报》）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武器，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使党内资产阶级陷入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使他们的复辟阴谋难以得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之下，运用“四大”武器，摧毁了刘少奇、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又是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广大群众在斗争中将越来越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样，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将越来越困难。如果党的基本路线不被广大群众所掌握，那就是十分危险的。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和党内资产阶级斗，只要夺了走资派的权，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事实真的如此吗？不！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把路线交给群众，

不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彻底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仅仅夺了几个走资派的权，还不能说战胜了党内资产阶级，因为修正主义的余毒还未肃清，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伺机反扑。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在苏联复辟呢？从无产阶级这一方来找原因，就有一个广大群众掌握不掌握马克思主义路线，识别不识别修正主义路线的大问题。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苏联曾清洗了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沃兹涅先斯基，等等。但是，这些人被清洗以后，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纲领、路线，并没有发动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批判，使全国人民都知道。以致后来的党内资产阶级如赫鲁晓夫之流，仍旧能够利用这些修正主义的理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例如，沃兹涅先斯基，他原来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此人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已经“堵绝了产生阶级和资本的渠道”，“排除了在苏维埃国家恢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开出的发展经济的“单方”是“加强一长制”，“严格劳动纪律”，“强化卢布监督”，“依靠物质刺激”，“彻底实行累进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等等。一九五〇年，他被清洗了。但是，并没有发动苏联广大人民批判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因而，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仍能按照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制定一条变本加厉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为他翻案，给他戴上“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社会主义计划的卓越组织者”等桂冠，还把列宁格勒财经学院改名叫沃兹涅先斯基财经学院。请看，沃兹涅先斯基是被清洗了，他的权已经没有了，可是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却还活着，正在发生危害苏联人民的作用。由此可见，不把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不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路线问题，那末，修正主义路线一有机会就会沉渣泛起，甚至取得统治地位。林彪把文化大革命歪曲为“罢官”革命，目的是阻止革命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以便他在一片“罢官”声中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面对修正主义者反夺权的斗争，我们不仅要针锋相对地夺回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篡夺去的权力，而且要从思想政治路线上把党内资产阶级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如此反复进行，坚持下去，党内资产阶级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就不容易了。

理论是政治路线的基础。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就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对于分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关系极大。例如，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时候，许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就及时识破了这条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指出它在哲学方面是鼓吹折中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鼓吹唯生产力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这样，这些同志就把自己对修正主义仇恨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因而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就更深刻、更有力。因此，“**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转引自1971年4月9日《人民日报》）就是我们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根本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蔚然成风。今天，毛主席去世了。广大共产党员、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最好的实际行动悼念毛主席，正发奋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和重要指示。我国各族

人民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真正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将会大大加速我们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的工作。

上面讲的是第一个问题：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群众。下面讲第二个问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要战胜党内资产阶级，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限制以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就等于要了资产阶级的命。因此，无产阶级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一定会遭到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激烈反抗。限制和反限制，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完成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任务，要比推翻旧政权困难的多。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一八八七年秋天，列宁进喀山大学读书。同年十二月，他参加了反对大学里的警察制度的学生抗议大会，因而被开除学籍，并被流放到喀山附近的柯库什基诺村。在流放途中，押送列宁的沙皇警官对他说：“小伙子，造反有什么好处，你不是向一堵石墙上撞吗？”列宁坚定而响亮地回答：“**是的，但这是一堵朽墙，一撞就倒的。**”一点不错，俄国沙皇的反动政权确实貌似强大，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腐朽了的沙皇专制政权，不过是“**一堵朽墙**”罢了。三十年以后，就被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彻底推翻了。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工人阶级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工人首创，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新生事物，曾被列宁称为“**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在列宁的热情支持和积极推广下，到第二年“五一”节，已发展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第二天，即五月二日，写了一篇文章，对这种“**铲除旧的社会关系和旧的经济关系**”的革命行动，也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行动，作了极高的评价。同时列宁指出：“**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因此“**我们面前有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坚持‘自由贸易’和坚持把劳动力当作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自由’买卖。**”（《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4-105页）

列宁把沙皇反动政权比作一堵“**朽墙**”，而把旧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即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作是“**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就形象地告诉我们，解决后一个任务要比解决前一个任务艰难得多。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9页）回顾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战斗历程，确实是这样。建国以来，无产阶级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资产阶级则竭力维护、强化和扩大

资产阶级法权。围绕着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双方已经斗了二十七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也说明，要完成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任务，是多么的艰巨啊！

要完成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任务，为什么这样艰巨？列宁说过：“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旧社会的“死尸”，包括旧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总和，这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东西，既不能象对待官僚资本那样，下一道命令，全部没收；也不能象对待民族资本家的企业那样，按政策规定，加以赎买。相反，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它还要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建国以来，我们基本上取消了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但还不能取消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相反，这些还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保障，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样，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赞美和宣扬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就有它一定的社会基础。人们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在资产阶级法权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中生活的，再加上党内资产阶级用资产阶级法权对人们进行欺骗和引诱，这就会使一部分觉悟不高、留恋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受骗上当，跟着他们跑，这就更增加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困难。

“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蛮不讲理的肥壤沃土。”（《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7页）党内资产阶级愈是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就愈是要和他们对着干。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逐步限制以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根本的途径就是大力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新就新在它包含着共产主义的幼芽。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意味着共产主义因素的茁壮成长。它将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有力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荡涤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因此，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和资产阶级法权不断受到限制的过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胜利，给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了。从经济关系方面来看，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中公社一级和大队一级集体经济日益壮大，这将有力地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大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建立和巩固，使工农群众更有力地参与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管理人员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工人为师，认真学一门至几门手艺，已经蔚然成风，企业中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善；在大量新工人中，已开始冲破八级工资制的框框；大量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间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新干部，仍旧领取原来的工资或工分，“做官不象官”。所有这些，都是对所有制、相互关系和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

步限制。在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上层建筑领域，也涌现了大量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如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等上层建筑单位；干部进“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同工农划等号；农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发展；工农兵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成長，等等。尽管从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全过程来看，这些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是已引起了党内走资派的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他们污蔑条件成熟的大队实行大队基本核算是“刮共产风”，是“限期退回去”；污蔑国营企业支持农村人民公社办社队企业，是“混淆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是“全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倒退”；污蔑在分配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搞绝对平均主义”，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然而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对新生事物的阴谋已相继破产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更加郁郁葱葱，茁壮成长。资本主义的陈旧事物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壮大，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下）

上一次，我们讲了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方法，第一是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群众，第二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三、第四个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战胜党内资产阶级，必须敢于斗争，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党内走资派由于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来势是很凶、很猛的。当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敢不敢反潮流，这对于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转引自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又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都是斗出来的。敢于斗争，才能把党内走资派斗倒；敢于反潮流，才能把修正主义路线反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把一批革命造反派战士和红卫兵小将打成“右派”、“反党分子”、“牛鬼蛇神”。但是，革命造反派战士和红卫兵小将受到了毛主席的热烈赞扬和支持。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全国各地许多革命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敢于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开顶风船，坚决同邓小平对着

干。象辽宁柴河铅锌矿党委书记宿晓琴、上海星火零件厂青年工人鲁新民、广西梧州市光学仪器厂理论小组成员等等，都是反潮流的好榜样。正因为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尽管邓小平一时气势汹汹，似乎很有力量，但终究是一只纸老虎，一戳就穿。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奋起反击，又取得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邓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涌现了大量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决不是个人之间的交锋，而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6页）在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要出于公心、挺身而出，要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五不怕”**革命精神。无私才能无畏，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自觉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才能敢于斗争，坚持斗争，才能提高同走资派斗争的自觉性，增强斗争的勇气。

在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还要善于斗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1页）因此，团结大多数，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原则。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不仅要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还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一崇高的事业，就必须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进行共同的斗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16页）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历来十分重视革命团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生动地证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战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的强大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个真理。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都是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全国人民大团结，才战胜了国内外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地取得新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小官、学生、工、农、兵，是要革命的，他们是不能容忍党内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在他们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广大的群众和干部，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党内资产阶级就彻底地孤立了。

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团结起来，在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克敌制胜，也要善于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同一切事物一样，党内走资派也是可分的。对于炮制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对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当前要集中火力批邓，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批邓斗争中，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包括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干部。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则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评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持欢迎的态度，鼓励和帮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将功补过。

团结大多数的过程，是同党内资产阶级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的行为作斗争的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党内资产阶级懂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坚强团结，是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高岗、饶漱石组织反党联盟，彭德怀搞反革命军事俱乐部，刘少奇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林彪拼凑反革命小“舰队”，妄图另立中央，邓小平组织“还乡团”，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妄图破坏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我们对于党内资产阶级破坏革命团结的阴谋必须高度警惕，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四期）这三项重要原则。这三项重要原则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重要标志，我们必须同党内资产阶级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上面讲的是第三个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下面讲第四个问题：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方法，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将越来越多，这是无疑的。但是，归根到底，都要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曾作过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333页）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

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马克思的论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要战胜党内资产阶级，就要不断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要在一切领域和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有的如果不警惕，也会变。对于已经变的，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批判、斗争。如果他们要发动反革命政变，要挑起类似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反革命暴乱，那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要把他们击得粉碎。对于正在变的，要进行批评帮助，使其迅速认识错误，及时地从修正主义泥坑的边缘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警惕资产阶级的腐蚀，尽可能地防止他们向党内资产阶级方向演变。

无产阶级在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还要消灭党内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限制、缩小并最终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经济基础方面，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要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领导权，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际上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掌握在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手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要改造小生产，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同资本主义势力作坚决斗争；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积极扶植和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为最终“**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斗争。

在上层建筑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断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不断克服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干部要与工人实行三同，克服官僚主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把国家机关建设成革命化的为人民谋利益的组织，防止走资派利用人民给的权力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在群众中广泛地、深入地、持久地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消灭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条件；要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阵地。总之，“**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决不能允许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一切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泛滥。

毛主席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转引自一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我们一定要千万注意，不断总结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学会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方法，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特别注意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逐步铲除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党内出现资产阶级，表面上看起来有权有势，张牙舞爪，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他们刮着资产阶级的“西风”，骑着复辟倒退的“瘦马”，去走资本主义的“古道”，完全是倒行逆施。他们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是极端虚弱的和孤立的，是纸老虎，革命人民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我们通过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更加坚定了彻底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信心。我们坚信，尽管斗争中会有曲折和反复，但是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无产阶级。

第八讲：前途光明 道路曲折

（未及播讲）

上一次我们讲了《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方法》，今天讲最后一讲，题目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一个客观规律；第二部分讲党内资产阶级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第三部分讲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现在讲第一个问题：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一个客观规律。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始终存在着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始终在走。那末，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究竟怎样呢？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能不能最终被消灭呢？

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历史上出现，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当这种生产关系产生的时候，代表这种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还很年轻，它同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当时，资产阶级联合了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在打倒了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起来，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日益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化了。它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走上了灭亡的阶段，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则日益壮大起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趋于灭亡的主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过程。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是自由资产阶级，当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则转化为垄断资产阶级。这时，资产阶级已经处在垂死阶段了。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打倒了，党内资产阶级则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已被推翻的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它已成为整个资产阶级走向灭亡阶段出现的最后一个派别。不管资产阶级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走过什么阶段，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代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党内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前，力图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则力图强化和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走向灭亡的最后一个派别，也还有它自己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在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过程中展开的。这个过程的主要矛盾方面，已不是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了。这就决定了党内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再生产不仅是劳动产品的再生产，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因而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必然要不断地再生产出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地滋长出各种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新生事物；另一方面，也必然不断地再生产出资产阶级法权，并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旧土壤上再生产出新资产阶级分子。但是，社会主义再生产不是简单再生产。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总趋势是由低向高地向前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逐步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日益缩小，个人消费品分配中按需分配的因素逐步增长，总之，是共产主义因素表现出增长的趋势，而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则表现出相反方向的运动，表现出日益削弱和消亡的趋势。新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主要是在商品制度这一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土壤上产生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既有着共产主义的因素的日益增长，三大差别的逐步缩小，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日益削弱，这样，商品制度赖以存在的条件必将日益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交换关系必将逐步向着产品直接分配的方向过渡。这就是说，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必将日益削弱。当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被彻底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历史任务最终实现的时候，包括党内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就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了。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必然要灭亡。无产阶级正是在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乐观主义的信心，建立起从战略上藐视党内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是现实地存在着的。苏联的党内资产阶级不就是在苏联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吗？但是，随着这个反动阶级同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这个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鉴于苏联的教训，我们对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要提高警惕，认真对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一

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外或减轻分娩的痛苦。”毛主席为我们探索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资产阶级的运动规律，我们虽然不能下令取消这个规律，但我们认识了党内资产阶级的运动规律，就有可能使它不至于象苏联那样重新骑到人民的头上来。邓小平亲自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是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但是，只要我们用毛主席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武装起来，就能识别《论总纲》的反动本质。它的反动性就是抹煞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把矛头指向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即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这就彻底暴露了邓小平的狰狞面目。因此，对于党内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干什么工作，都不可忘记。忘记了它，就是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就会走偏方向。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识别党内资产阶级，战胜党内资产阶级。

现在我们接着讲第二个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

毛主席在分析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质时曾经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二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有二重性，他们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毛主席的这个分析完全适用于党内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样，党内资产阶级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

说党内资产阶级是真老虎，是说它复辟资本主义是很凶的，具有极端的反革命的疯狂性。这种疯狂性，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处在灭亡时候的垂死挣扎。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希特勒的“座右铭”是“心要狠！手要辣！”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完全继承了法西斯的这种反革命的疯狂性。他们一旦得势，就要吃人。他们在政治上要求的决不是什么民主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只要看一看充满血腥味的《“571”工程纪要》，看一看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明白了。在中国，只是由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握住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当党内资产阶级露出獠牙，准备吃人的时候，及时地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才使他们的吃人阴谋不能得逞。

但是，在苏联，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联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党政大权以后，他们吃人的阴谋则暂时地得逞了。他们成百万人成千万人的吃，冤狱遍于国中，叛徒弹冠相庆；集中营遍地林立，“疯人院”到处开张；特务横行不法，贪官敲骨吸髓，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呻吟在暗无天日的地狱之中。

党内资产阶级迫害革命人民的这种疯狂性，充分说明他们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凶恶的敌人。他们张牙舞爪还很厉害，他们是活的铁的真老虎，他们会吃人的。我们要从这点上建立起策略和战术思想，重视敌人，采取必要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

但是，从战略上看，从本质上看，党内资产阶级又是纸老虎。这是由于它代表着历史上已经腐朽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股处在灭亡阶段的反动势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把司令部搬到共产党内，既不敢打出公开的旗号，又不敢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而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依靠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干着修正主义的勾当。这恰恰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纸老虎的本质。尽管它貌似强大，但本质上是极其虚弱的，是外强中干的。在苏联，党内资产阶级实现了全面复辟，好象不可一世，它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恣意掠夺，张牙舞爪，妄图称霸世界，是一个凶神恶煞。但是，它的日子很不好过。今日的苏联，看起来象个庞然大物，气势汹汹，其实象一棵蛀空了的大树，正在一天天地烂下去。二十多年来，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不断下降，民用工业非常落后，既要进口大量的技术设备，又要进口工业消费品。农业更是一团糟，粮食大幅度地减产。财政紧张，欠的内债就有三百四十四亿卢布，借外债已达数百亿美元，而且正在加紧四出乞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一。苏修已陷入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处境之中。“**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当前，苏联人民的抗暴斗争方兴未艾。苏修叛徒集团就象坐在火山口上，离灭亡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在我国，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样虚弱得很。林彪一伙一面狂叫“破釜沉舟”，一面又宣称：“一切均昙花一现，勿太认真。”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一面狂叫“拼老命”，“不怕被打倒”，一面又扬言：“看破红尘，无所谓了。”他们这种没落阶级的绝望的哀鸣，深刻地反映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历史尽头。“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这就是垂死没落阶级的形象，也是对党内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是生气勃勃的、革命的。那末，党内资产阶级则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已被推翻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堆上长出来的毒草，再没有一丝一毫革命性了，有的只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这就决定了党内资产阶级同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比起来，更加暴露了它的纸老虎的本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932页。）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是要革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于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决不答应的。毛主席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转引自1975年3月1日《人民日报》）党内资产阶级这种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两重性，告诉我们，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他们，认真对待。它们是真老虎，活老虎，是要吃人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着复辟的危险性，对党内资产阶级的任何掉以轻心，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但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又必须如实地把它们看成是纸老虎，豆腐老虎，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党内资产阶级完全是可以战胜的。

现在讲最后一个问题：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就是坚持党的基本纲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党的最终目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的最高司令部。我们党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程，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广大党员，不愧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不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我们把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出来，这正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应有态度，这正说明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毛主席断言：“**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出：“**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今天，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具备的优胜条件，同解放战争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命线。过去，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今后，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内资产阶级的进攻，完全是能够打败的，我们必将不断地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不断胜利。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党内资产阶级的出现，是一股渺小的逆流。经过我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共产主义的朝阳已在我国辽阔的地平线上升起。共产主义是斗出来的，每一次斗争的胜利就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每经过一次斗争，共产主义因素就进一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基础就进一步受到削弱。共产主义就是在这样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中逐步实现的。只要我们再接再厉，坚持不懈，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地斗下去，共产主义事业是一定要实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巍然屹立。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的大军越战越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断巩固扩大。国家要独立，

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两个超级大国，已陷入世界亿万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策划新的世界大战，妄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称霸世界。苏修这个无恶不作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世界上干尽了坏事、丑事，全世界人民是决不会饶恕他们的。“**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面崩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放眼世界，环视宇内，我们豪情满怀，信心倍增：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国内外、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惟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

鲜红的大阳必将照遍全球，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